

王雲五主編
徐道鄰編述

民國徐又錚先生樹錚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徐又錚先生樹錚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三角正

編述者 徐 道 鄰

主編者 王 雲 五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片編中國名人年譜卷八 評卷索引

所謂新滿洲國也。中國人等議集咸以爲此舉之
中實有民力同一亡也。因抗戰而中止。若日方
固二十一年一二、五年後始復其舊山河耳。這二十
六年八一三之夜乃抗戰時期。利刃在彼矣。今
決議者援馬條一節分。以保收粵東方面之利益
司。先後訪明亦收市數十萬冊，其中檢有各
種一百二十餘種，連同中國史地書刊而收佔回
外者皆新書及平裝，合計不下二百餘種。以所
擬加詳查。藉慰羣情之心，宜於此案，多所補

諸君所訂，或曰校書中八人等述，不知上所謂
之注也。久矣，吾人相若，誠見此或遺物也。
功者，陳本則議主記經，古本而得之史官大
都詳確。古代其北原以諸部名山何所云一，故
解有顧思，今與唐氏已更爲新領，乃諸部可稱
，通者不利於新領之記載，甘其刪法，七或曲
其力之。年而後自修史者多矣，有正焉哉。余
也，吾曾重出古，今則清其師，然曰是方免
生事也。抄與新人等語相投，終、乃世異矣。
中亦實有誤之多，謬之累也。

至唐五代以前，
漢之選書，
其：然余治一略，
自漢之世也。

今其始竟於此，
其母，
以書選書，
其：然余治一略，
自漢之世也。

精なり。其版成り同大古紙一萬二千二百五十
 十張あり二十の分三十二百、廿二、廿五、
 原大古小五反、廿の分五張了張小、字體上段
 並多初、左原土地書か作廿二、廿五、信今防区
 小、右原、信今防區、人、只原、
 の者、字體略小、所定を讀み、多の中よりハ
 七、田一棒好く、中、書、字體略改而、
 大、且、書、字體、可、中、一、段、方、有、佳、化、の、同、業、出
 明、山、山、仙、入、身、成、月、如、有、法、後、所、極、想、回、不
 不、能、解、必、當、不、知、道、心、地、語、也、是、乃、方

中華書局七十年十月一日王雲五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愆前愆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治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闕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雲老逝世後，本館另行蒐集者。因不在原定目錄之內，刊行之時，則不標明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年譜序

民國二十一年，我從德國留學回來，去看胡適之先生，他勸我給我父親寫一本傳記。並且說事不宜遲。我答應他一定寫。現在總算寫出這本年譜了。可是一轉眼就是三十年。

這三十年中間，當然有許多重要的文件佚失了，有許多知道內幕的人物去世了。這都是不能補救的損失。

但是時間也發生了它的好的作用。

因為若干當時身當其衝的人物，年紀大了幾十歲，比較心平氣和，且以時過境遷，沒有那麼多的顧忌，所以能作更爲客觀和完整的透露。再則時間長了，各方面出現和整理的材料，自然多些，對於後來的工作者，足以作比較和參證的資料，也就更爲充份。

根據我的認識，最知道我父親一生的，是方立之先生。但是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使他灰心。他對任何事情都不起勁，哪還有心替別人去捕捉過眼的煙雲？其次是曾雲霄先生，但是他的心情，比方先生也好不多少。

幸虧還有張乾若先生在着。這位老人，不但是這個時期中長久的中心人物——他接近的人物，從袁世凱到吳佩孚；他作過府秘書長，院秘書長，和六任總長——晚年治學，有極高度的修養，並且精神十

分壯健，而且有心於民國史；他對於一切和民國史有關的材料，時時刻刻在搜集，在整理。

張先生是不大肯寫作的。但是他有一位同鄉陶菊隱先生，常常找他談天，把所得的材料，筆之成書——六君子傳，督軍團傳，都是這樣寫成的——他最近出版了一部「北洋史話」，這是我寫這本年譜的重要資料之一。書中所敘述的事實——我曾經拿若干其他史料核對過——大部份都還可靠。所表示的對我父親的態度，似乎也還公平。因為如果對他太好，他不會用那麼多挖苦和諷刺的字眼。如果太不好，也就用不着把他寫得那樣生龍活虎。我之大量引用原文，就是不願意對作者的語氣態度，輕易的多所改變。

其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年出版了「中俄關係史料」中關於「外蒙古」的一本。我父親民國八年收復外蒙古的一段史實，差不多可以從這裡面重新建造起來。不用說，這是一宗極重要的歷史資料。

此外，近幾年還出版了若干年譜傳記，如梁燕孫年譜，葉遐菴年譜，梁任公年譜，吳佩孚集等等，都是很有用的參考資料。

現在談一談我們在今天要研究段祺瑞時代的政治所不可忽略的兩點事實：

一、段祺瑞的左右，在當時和後來，每以「親日派」的色彩，而被人加以「賣國賊」的頭銜，這是國內國外許多因素所造成的一項冤案，我們不能不予以申雪。

原來在民國初建的時候，東西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是維持在一種均勢之下的——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六國（英、美、法、德、俄、日）銀行團之成立，就是最好的說明——這時中國人對於這些國家，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好惡。到了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歐戰已進入高潮，西方國家，尤其是在中國一向居於領導地位的英國，其全部力量，已經被吸引歐洲戰場上，沒有餘力顧到遠東，於是日本認為中國是它獨佔的勢力範圍。而當時的大隈內閣，是相信可以用武力使中國屈服的，所以就在二月至五月間，提出二十一條的談判。結果雖然得到一部份的結果，但是在全中國引起了普遍和強烈的反日怒潮——「毋忘國恥」，「抵制日貨」的口號和標語，當時遍及南北——五年（一九一六）十月，日本寺內內閣成立，一方面鑒於大隈內閣的武力政策之並沒有真正成功，一方面因為歐戰中日本的畸形繁榮，資金沒有出路，就想用經濟力量來換取中國的合作，於是提出其所謂「中日親善論」和「經濟援華政策」來，而段祺瑞就是他援助的對象。段祺瑞當時之可以接二連三的支配總統的地位——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這三位總統，都是段抬出來的——這外交上的支援，也是他主要的力量。但是到了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底，歐戰已近尾聲，英美國家又恢復了它們在遠東的興趣和力量，自然首先要設法打破日本的獨佔局勢，於是就幫助和段系處於敵對地位的直系——特別在宣傳上對於吳佩孚大捧特捧（註）——直接的是打擊段系，間接的也就在打擊日本。這時候中國的政府，雖然和日本合作的很好，但是廣大的民衆，尤其是青年和知識份子，却依然懷抱着十分強烈的反日心理。因此直系和英美的宣傳機構，就給段系人物

加上「親日派」和「賣國賊」的頭銜，大力的加以攻擊。這是適合當時一般民衆心理的有利攻勢，其成功自不待言。八年五月間，瀰漫全國的學生「五四」運動，和曹、章、陸三人的罷免（六月十日），就是他們成功的說明。而段系這一方面呢，因爲在宣傳上處於劣勢，絲毫沒有辯白的機會，一直到今天。

註：「西方國家看中了吳佩孚是一個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國唯一的『英雄』，在報紙上竭力加以渲染，而吳自己也就飄飄然自負爲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北洋史話，五，頁一八〇）。九年八月十三日，張作霖對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說：「吳佩孚不過是別人的傀儡，他的背後有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英國人」（同上，頁一八三）。

然而事實上，「親日」不過是一種政策，是一種有時間性的策略，並非一種投降歸順的心理，怎麼可以就說是「賣國」？而且照當時的環境說，這也是唯一可以採取的策略。因爲日本的力量太強，靠中國太近，對中國情形太明瞭，到處的佈置太周密。任何事情，得到日本的諒解，就容易成功——例如民國六年之討伐張勳——不得到日本的諒解，就難免失敗——例如十四年郭松齡對張作霖之叛變——所以和日本取得某一程度的妥協——尤其是當西方國家被牽制在歐洲戰場上的階段——在當時可以說是絕對必要。

而且採取親日「政策」的人，在「心理」上並不一定就是親日。我父親當時是被人認爲親日派首領的，但是在內心裡，他却是一個十分不歡喜日本的人（事實上，那個時期的留日學生，十有八九，都是反日的）。他在民國三年，以軍火接濟防守青島的德軍以抵抗日本，就是最好的證據。而且接受日本

的援助，也並不是就一定不能作和日本利害有衝突的事情。我父親民國八年之收復外蒙，就是用以日械裝備的部隊把外蒙古從日本的威脅下奪取過來，可見以「親日」得來的力量，還是可以用之於「抗日」的行動上的。

而且在「賣國賊」頭銜之下被犧牲的，並不乏有品格有才幹的人物。即如五四高潮中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事實上都不是壞人。章和段的關係是很疏遠的，何嘗是他的「親信」？他的私德學問都很好。陸是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出過大力的人。曹則在幾次大借款中，未取分文回扣（註），在今天看來，真是了不起。而在當時全國的斥罵聲中，一生再也抬不起頭來。歷史的冤屈，真是够慘酷的。這一點我們不可以不予注意。

註：段祺瑞在他的「正道居集」裡，有下面這一首詩：

「不辰持正義，十稔朝政裡，立意張四維，一往前如矢。側目忌憚者，無詞可比擬，謂「左右」不善，信口相詬訾。唱和聲嘈雜，一世膏風靡；「賣國」曹陸章，何嘗究所以？章我素遠隔，何故謗未弭？三君會同學，宮商聯角徵，休怪殃池魚，只因城門燬。歐戰我積弱，比鄰恰桑指，強哉陸不撓，樽俎費唇齒，撤回第五件，智力已足使。曹送掌度支，調言騰聲政，貸借乃通例，胡不諒人只？款皆十足交，絲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誣蔑乃復爾。忠恕固難喻，甘以非爲是，數難百兆零，案可考終始。參戰所收回，奚啻十倍徙。」

二、段祺瑞當時以主張用武力征服西南，被直系人物加以「主戰」的惡名，而爲國人所不諒解，這

一點我們也必須加以說明。

「主戰」是與「主和」對立的。民國六年，段祺瑞推翻復辟之後，捧出馮國璋來作總統。這時候南方的「護法政府」，尚在和北政府對峙之中。段是一直主張用武力予以征服，以謀取真正統一的。而馮則倡出和平解決的口號，打算容忍南方事實上的獨立，以換取他們對北方政府在名義上的承認。換句話說，也就是容忍地方割據的繼續存在和惡化。

而事實上，中國地方軍閥之專橫跋扈，到這時已經鬧得不成話了。而其所以發展到這樣地步，則背後尚有其長久和複雜的歷史因素。

原來在清朝末年，各省督撫已經久為實際統治地方的小皇帝，民間把總督的地位，看得極高（李鴻章二十幾年的長久勢力，格外提高了總督位置的威望）。而在辛亥革命之際，各地起義的，多數屬於新軍，而新軍成立不久，其將領的資格都不高。所以革命後各地方的「都督」，好幾個祇是原來的「協統」旅長（如武昌之黎元洪，南昌之吳介璋，山西之閻錫山），就是以「總統」團長（如九江之馬毓寶）「管帶」營長（如陝西之張鳳翔，鎮江之林述慶）或「教練官」（如貴州之楊蔭城）作都督的，都不乏其人。所以在大家心理上，都督就等於總督，地位依然是極高，但是已經不像革命以前那樣高不可攀了。

在袁世凱作總統的初期，他把都督的位置看得很高，都是選資格比較深的「大員」來充任的。到了湖口之役（二年七月），爲了應付軍事上的需要，他派陸軍第六師師長李純作江西都督（二年九月二十

二日），才引起了師長階級的人對都督發生興趣。但是這時候他仍然不輕易給人的，所以在民國四年八月中，王占元（陸軍第二師師長）想湖北，張作霖（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想奉天，都沒有能够到手（湖北給了張錫鑾，奉天給了段芝貴）。但是到了民國五年，爲了推進帝制，要收買地方軍人，短期內一連發表三位師長作都督——王占元督鄂（一月八日），陳炳堃（桂軍第一師師長）督桂（三月七日），張作霖督奉（三月七日）——於是舉國之內，沒有一個師長不想作督軍，也沒有一個軍人不想作師長了。在這個時候，不但接受袁世凱的收買，可以升任都督，就是反對他而「獨立」，也可以達到作都督的希望。五年五月十八日，原任陝北鎮守使的陳樹藩，就以反袁獨立，而自任爲陝西都督（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也宣布獨立而自稱四川護國軍總司令）。

因爲在「南」「北」對立的局勢之下，到了「師長」階級，就有資格宣布「獨立」——最早的如民國二年八月四日，熊克武之以川軍第三師師長宣布獨立就是。到了後來，不少軍人，都在接受了對方收買之後，宣布「獨立」，一方面借以提高自己的名氣，一方面也趁此擴充實力，作下一次更大的投機的資本。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陸軍第十七師師長陳復初，十三月一日，江蘇留鄂第一師師長黎天才，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就是這樣宣布獨立的。而南方軍人之投順北方的，也不乏其人：六年九月中，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宣布脫離軍政府，卽其例也。

而軍人之動輒「獨立」，並不一定需要政治上的大題目，如「反對帝制」，「反對復辟」，「反對